



文艺研究新视野

刘云春 著

历史叙事传统语境下的 中国古典小说审美研究

The Study of Chinese Classical Novel in the
Context of Historical Narration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刘云春 著

历史叙事传统语境下的 中国古典小说审美研究

The Study of Chinese Classical Novel in the
Context of Historical Narration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历史叙事传统语境下的中国古典小说审美研究/刘云春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0.9

ISBN 978-7-5004-8844-6

I. ①历… II. ①刘… III. ①古典小说-文学研究-中国

IV. ①I207.4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09072 号

策划编辑 郭晓鸿(guoxiaohong149@163.com)

责任编辑 储诚喜

责任校对 王俊超

封面设计 格子工作室

技术编辑 戴 宽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3 传 真 010—84017153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0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17.5 插 页 2

字 数 265 千字

定 价 30.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前 言

历史叙事与小说叙事的关系，是东西方文学批评都十分关注的一个问题，也是一个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因为它涉及多学科理论和多种研究方法综合运用，因此也是一个很难厘清的问题。近年来美国著名思想史家、文学批评家和历史学家海登·怀特（Hayden White）（1928— ）提出的历史叙事理论对史学、哲学以及文学研究领域的影响都很大。其理论不仅颠覆了历史即是事实这一古老的史学定论，还提出了崭新的观点。他认为任何历史作品都是一种深层的诗学结构，而正是叙事，打通了文学话语和历史话语之间的边界。20 世纪 70 年代，他撰写了《元史学：19 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和《话语转义学》等著作，展开了他的“历史诗学”这一原创性的理论学说。他的学说引起了文化理论和文学批评的范式变革。可以说，海登·怀特的历史叙事理论是统领文史哲三门学科的宏大叙事，其意义和影响是不容忽视的。事实上，海登·怀特研究的是历史研究方法。他的基本观点是：就所涉及的史实性材料而言，历史修撰与其他方式的写作没有什么区别。历史修撰中最重要的不是史实性内容而是文本语言形式。历史是以叙事散文话语为形式的语言结构。^①

后现代历史叙事学提出的语境是非常独特的。20 世纪末期，后现代主

^① [美] 海登·怀特：《后现代历史叙事学》，陈永国、张万娟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 年版，译者前言，第 1—2 页。

义作为一种宏大历史话语的合法性已经受到了普遍怀疑。海登·怀特在后现代主义遭受普遍怀疑的语境下建构历史进程的诗性叙事，试图重建历史与诗歌、科学和哲学的深层联系。怀特的理论探索显示了一种伦理关怀和政治抱负：在神话和科学之间寻觅历史话语深层结构的诗性，在审美（叙事形式）、认识（阐释策略）和伦理（意识形态）等多个层面、在文化语境和文本互动中获取历史的真实。

怀特的理论为研究历史叙事与文学叙事之间的联系提供了新的思路。他的后现代历史叙事学弥合了以往历史和文学之间的沟壑。他认为，那种把小说看成是想象、把历史看成是事实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小说和历史都要建构故事。在建构故事的过程中，历史叙述也不可避免地要引进小说的因素，事实与虚构之间有着一种不可分割的统一性。“小说家或许一直仅仅处理虚构的事件，与此相反，历史学家一直在处理真正的事件，但是把这些不管是虚构还是真实的事件糅合为一个易于理解的总体来表现目的的过程都是一个诗化过程。”^①

后现代历史叙事学的启发，使文学与历史叙事的关系问题再次受到热烈的关注。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历史与小说之间的暧昧关系由来已久。西方早期的现实主义小说和中国的传统小说，都对真实性超乎寻常地重视，因而小说总是被置换于历史的名义之下。小说总是以反小说而亲历史的姿态来争取读者的认同。一部小说往往并不被看做是小说，而是被当作深深根植于历史与真实经验的报告。小说也总喜欢把自己描述成“不是什么”，而耻于把自己描述为“是什么”。小说总要假托自己是历史或心理的某种语言，以此来体现其合法性。^②历史与文学之间的边野界限不明，是东西方文学中的共同现象。

西方文学中普遍存在着历史与文学互化的现象，历史学家和文学批评

① 转引自陈启能等主编《书写历史》第1辑，*The Debate between George Iggers and Haden White*，上海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12页。

② [美] J. 希利斯·米勒：《重申解构主义》，郭英剑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7页。

家也时有论述。历史学家汤因比就曾举例说《伊利亚特》既可以当作历史来读，又充满了虚构。^①直到19世纪关于历史属于科学还是艺术的问题依然属于悬案，历史著作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现象也时有发生。1902年法国史学家蒙森的史学著作《罗马史》就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1953年丘吉尔则因《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中历史与传记方面的深厚造诣摘走了诺贝尔文学奖桂冠。可以说，文学一直无法拒绝历史叙事的魅力。小说家亨利·詹姆斯也曾极力向历史阵营靠拢。他公然宣称：小说家只能把自己当作历史学家，小说家作为虚构叙事者是毫无地位的。他说：“小说家只能把自己当作历史学家、把自己的叙事当作历史，除此外，还真难想象他还能把自己当作什么。只有作一位历史学家，他才有最起码确认的地位，而作为虚构事件的叙事者，他就毫无地位；为了使他的企图得到某种逻辑的支持，他必须叙述那些假定是真实的事件。这种假定是充斥着最严肃的讲故事的人们的作品，同时也激励着他们的创作。”^②

这种文史之间的纠结，究其根源，在于历史和小说都要借用叙事这一中介。“研究表明，叙事绝对不是一个可以完全清晰地再现事件——不论是想象的还是真实的事件——的中性媒介。它以话语形式表达关于世界及其结构和进程的清晰的体验和思考模式。的确，话语模式千百年来就一方面与神话和宗教思想，另一方面与文学虚构密不可分，正因为如此，人们把叙事性历史作为神话思维在历史反思中的表现而加以谴责。”^③只有从历史与小说共有的叙事入手，才能揭示二者之间的纠结本质。海登·怀特从历史叙事的情节编排模式、形式论证模式以及意识形态含义解释模式三个方面入手，解释了历史叙事的诗性和美学意义，为我们理解历史与小说的暧昧关系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他看到，历史首先是一种写作，一种修辞的灵活运用，一种语言结构的叙事构型。历史不仅仅是对史实面貌的再

① [英] 汤因比：《历史研究》（上），曹未风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55页。

② 转引自[美] J. 希利斯·米勒《重申解构主义》，郭英剑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9页。

③ [美] 海登·怀特：《后现代历史叙事学》，陈永国、张万娟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46页。

现，还是一种埋藏在历史学家内心深处的想象性建构，而这种建构总是有意无意地遵循着特定时代的深层结构。

在中国古典小说文体的演变史中，历史与小说之间的这种关系与西方既相似又不同。古典小说从一开始就遭遇了历史叙事的无情挤压，小说长期在历史的统领下生存。直到唐传奇的出现，中国历史叙事对小说的影响都基本是单向的，压根儿不存在小说与历史互化的问题。“如果说可以将文学与历史边界的模糊性理解作一种孪生性的话，那么中国小说与历史之间的关系则只能称得上是一种寄生性。小说委曲求全地寄生于历史的母体上，处处都必受到历史的监视与苛责，绝对没有自己独立的个性可言。直到晚清梁启超‘小说界革命’发起之后，历史自古表现出的对小说的无休止纠缠才开始宣告结束。”^①中国古典小说一诞生就遭遇了强势的史传语境，而史传传统造就了成熟的历史叙事范式。这种叙事艺术主要是从《国语》、《战国策》、《史记》和《汉书》等史传中生长起来的表述策略和叙事规则。其中《史记》被鲁迅称为“无韵之《离骚》”^②，正说明了史传作品高超的叙事技巧不在文学作品之下。古典小说的孕育和成长恰好就是由史传母腹开始的，因此注定要长久地踟蹰于史传的背影之下，依循历史叙事所规约的方向谨慎前进。中国古典小说以史传作为参照，模仿史传笔法，记录史籍未载之事，故被称为“稗史”或“正史之余”。早期的小说大多数是由历史学家“率尔而作”，自然而然地遵照写史的技法和要求，将小说当作史传的一个分支来料理，这无疑制约了小说文体的独立与发展。“集正史所遗，补国史之阙”的小说品格，要求小说必须固守史传的实录原则来写，这势必又要拒绝作者个人的想象以及虚构。作为小说文体特征之一的想象及虚构，一开始就成了小说的天敌。古代小说的实录原则，严重地遏制了作者自由想象的冲动，也拒绝了作者个人主观感情的渗入，结果导致小说迟迟不能摆脱史传的钳制。中国古代小说为了迎合史传的正统

^① 路文彬：《历史想象的现实诉求——中国当代小说历史观的承传与变革》，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03 年版，导论，第 2 页。

^② 《鲁迅全集》第十卷，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429 页。

规范，在很长一段时间中牺牲了最基本的文体特性——虚构性。这种亲史的传统为古典小说的发展规定了一个实用的道德伦理方向，致使小说长久地纠缠于儒家伦理理念，从而缺乏深刻的人性透视和真正的浪漫主义气质。

历史叙事从上而下俯视底层民众的叙事姿态，影响了小说文体的独立。当明清小说尤其是世情小说张扬着由下而上的市民叙事姿态时，小说领域的革命出现了。古典小说呈现出了狂欢化的品格，小说文体的小说性得以形成，文体独立得以真正实现。这个时期的小说，叙事模式以及叙事图景的改变都是引人注目的。不可否认，小说文体独立的过程也就是突破历史叙事单向钳制的过程。这个独立的过程中，宋元市民文化孕育的话本小说起着非常关键的促进作用。话本小说的发生与兴盛，凝聚着数百年民间说书人和文人的双重智慧。民间讲史艺人敷衍笔记传奇的同时，无疑大量地汲取了文人笔墨中潜在的母题和情节模式。文人对话本艺术的参与，既意味着对正统的叛离，又必然为话本小说带来对村俗的超拔。说话技艺鲜活泼辣与文人精致圆融的审美意味，使话本小说逐渐被纳入了中国书面文化的系统中。可以说，叙事从上层的宏大叙事视角转向了下层的市民叙事视角，是古代叙事艺术脱离历史叙事而作为审美艺术独立的标志。在话本小说之前的唐传奇，已经可以看出这种叙事转变。虽然唐传奇已经将市井生活设置成叙事语境，但市民文化还没有成为其叙事的主流。虽然明清小说的作者大多数还是文人士大夫，但“文人士大夫对市井社会生活发生兴趣，这是市民文化发展到一个新阶段的重要特征。从叙事艺术的发展来看，只有当文人的创作对市民文化发生兴趣的时候，才是市民文化在叙事艺术的表现内容中真正具有了重要性的时候，同时也才是作为市民艺术的叙事走向成熟和向更高的艺术层次发展的契机”。^①对市民生存图景的零距离关注是小说叙事最终颠覆历史叙事规约的最有力手段，而日常化叙事的碎屑姿态又让小说回归了文体的最初的含义——“街谈巷议”。明清小说的狂欢化品质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理解小说文体的新视角。小说的通俗化，

^① 高小康：《中国古典叙事观念与意识形态》，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10页。

是文学发展回归民众主体性的重要体现。

本书不是作纯粹的叙事学研究，而是对小说文体演进轨迹的研究，探讨古典小说对历史叙事规范的依附、继承以及反叛。研究叙事文学的发展演变史，叙事学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话题。叙事学是西方在 20 世纪建构起来的一门学科，它是文学批评注重文本创作行为和结构形式的结果，也是理解小说文体最重要的方法学。叙事学提出了叙事视角、叙事时间、叙事结构等多个范畴，揭示了小说作者与叙述者、叙述者与被叙述者、所叙之事与故事之间的错综关系，并总结出一些通用的法则和范式。叙事学所提出的范畴、法则和范式，为我们研究小说提供了一套极精细的工具。

但是，中国叙事文学自有其特色，西方叙事学那套精细的范畴并不能完全适用于中国古典小说的研究。为区别于西方叙事学关于叙述者的分类，学者王平在其著作《中国古代小说叙事研究》中，总结出中国古代小说的四种类型的叙述者，分别命名为“史官式”、“传奇式”、“说话式”和“个性化”。虽然这种划分中的某些概念还过于笼统，但基本上总结了中国古代几类小说的叙事特征，大体符合实际，也是十分有意义的。^①事实上，对中国叙事学作出巨大贡献的还有学者杨义。他在其专著《中国叙事学》中主张，研究中国古典小说，必须返回原点，参照西方理论，贯通古今文献，融合创新。此外，还有著名的汉学者韩南以及浦安迪对中国叙事学的建构作出了重大贡献。因此，文中并没有简单机械地套用和照搬西方叙事学的所有范畴和公式，而是选择叙事学中叙事者和叙事视角两个主要方面，借用中国叙事学研究中的某些独特成果，结合文化研究来审视中国古

^① 王平：《中国古代小说叙事研究》，河北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版。此书第一章“叙事者”中提出中国古代小说有“史官式”、“传奇式”、“说话式”和“个性化”四种叙事者。前三种叙事基本与史传、传奇、话本小说对应，他把元、明、清章回小说的叙事者统称为“个性化”叙述者，他指出明代四大奇书是“史官式叙述者”与“说话式叙述者”的重叠，是“个性化”叙述模式的第一阶段，其中的叙述者与作者基本一致，也就是作者的爱憎褒贬与叙述者所表露的情感没有太大的差别。“个性化”叙事者的第二阶段是指以《醒世姻缘》、《儒林外史》、《红楼梦》为代表的个性化叙事模式，作者与叙述者已经发生了分离，小说中叙事技巧十分复杂，叙述者将本应属于自己的叙述职能转让给书中人物，既有自述也有他述，还有元叙事等。总的来说，个性化叙述者的提法还是显得笼统。

典小说文体演变的进程，以期对中国古典小说的研究提供一些新意。小说叙事虽然只关切文本形式，但是小说本身却必须根植于深厚的文化土壤。如明清小说叙事图景和叙事视角的下移，就与中国封建经济和城市文化的发展以及市民阶层的成熟和壮大密切相关。对这些问题避而不论，都是不明智的。

从历史与小说叙事的关系角度入手研究古典小说文体演变史，几乎还是个未开垦的领域。这一领域，固然有许多散见的单篇文章探讨相关问题，但大多数因为篇幅有限而局限于截取某个片断只做了局部研究。如李育红的《从新历史主义看史传与中国古典小说的亲 and 性》、李润芳的《中国古典小说里“史”的因素探因》以及朱家席的《〈三国演义〉文体在史传文学中的孕育》等就是典型的代表。在专著方面，也有少量的尝试，如路文彬的《历史想象的现实诉求——中国当代小说历史观的承传与变革》^①，就是运用后现代历史叙事的理论研究当代小说的历史观念的变革。其他一些精彩的古典小说文体史或者理论史，如石昌渝的《中国小说源流论》、董乃斌的《中国古典小说文体的独立》、陈平原的《中国散文小说史》、方正耀的《中国古典小说理论史》、韩进廉的《中国小说美学史》，等等，涉及了历史叙事与小说叙事的关系，但大多论述局限于先秦史传阶段和魏晋志人志怪小说阶段。随着小说文体意识的觉醒，到唐代传奇和宋元话本小说以后，都主要以小说的审美特征为论述重点。所以，历史叙事与中国古典小说叙事的关系问题依然是个有待深入探讨的领域。历史叙事对古典小说的影响或隐或显，历史演义小说因为特定的叙述对象，有一个貌似历史叙事的外在形式，其精髓早已貌合神离；英侠传奇、世情小说以及神魔小说在叙事手段以及叙事图景等方面，对历史叙事的规则都进行了

^① 路文彬：《历史想象的现实诉求——中国当代小说历史观的承传与变革》，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03 年版。此著仅在导论部分以“中国小说及历史关系探源”为题粗略地梳理了历史叙事与中国小说叙事的复杂关系。这是他论述的起点或说理论背景，不是他的论述目的。正如他在导论最后指出的那样，此著主要完成的工作是对中国当代小说历史观问题的梳理，最终的选取标尺是小说的叙述内容以及作者的回视姿态，选取的小说文本是能代表当时的历史消费时尚及显在变化的作品。

戏谑性的消解。通过狂欢化，小说不仅变革而且批判了传统历史对小说叙事的体制化钳制；通过戏谑，古典小说完成了从边缘到中心的蜕变。

在研究方法上，本书尝试了叙事学外部研究和狂欢化理论内部研究的结合。本书不是简单地贯穿中西方叙事学理论与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而是针对小说发展不同阶段最突出的文体特质，围绕主题进行阐述的。这毕竟不是系统的小说理论史研究，也不是纯粹的小说文体演变史研究，因此方法的运用是由所述论题在不同的阶段呈现出来的审美特征决定的，不是人为预设的。叙事学的方法是小说美学不可回避的一个方面，而巴赫金的狂欢诗学的含义十分丰富，它既是一种特有的艺术思维，是一种具有哲学层面的、文化层面的和文艺学层面的诗学理论，也是一种研究的思维与方法，更是研究小说变革发展真正动力的重要工具。通过狂欢化理论，我们才能真正理解小说的本质就是反规范性与杂语性，未完成性、易变性和多样性。小说在不同时代有不同的表现形态，小说史的分段也不是简单的自然演变过程的产物。“小说从本质上说就不可用范式来约束，它本身便是个可塑的东西。这一体裁永远在寻找，在探索自己，并不断改变自己已形成的一切形式。”^① 中国古典小说尤其是明清长篇小说从下层制造革命，直接指向历史叙事以及其他高雅文体、风格、语言，杂交各种文学性与非文学性因素，颠覆传统体裁观念，最终完成了文体独立。

需要特别说明的还有以下两点。

一、关于本书论域的确定。根据研究需要，本书把中国古典小说框定于“五四”运动之前而不是把《红楼梦》作为古典小说的终结。^② 学者王

① [俄]巴赫金：《小说理论》，参见《巴赫金全集》第3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544页。

② 石昌渝：《中国小说源流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395页。书中他就把《红楼梦》作为古典小说的终结标志。他认为《聊斋志异》是文言小说的绝响，《红楼梦》是白话小说但已经具备了现代小说的品格，此书一出，小说艺术的发展停滞了，直到一百多年以后的“五四”运动，中国小说才跨入一个新的时代。而学者王德威认为晚清小说在历史、美学、意识形态以及文化生产的角度都显示了极大的活力及其复杂性，研究其中所呈现的世变与维新、历史与想象、国族意识与主体情操、文学生产技术与日常生活实践等问题，对我们理解古代小说以及“五四”以后的小说都是不可忽视的阶段。由于本书研究的连续性，笔者尊崇后者的界定，以利于更好地贯穿主题。参见王德威《被压抑的现代性》，宋伟杰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德威认为，晚清小说在中国叙事文学的研究里，一向不受重视。但是不论从历史、美学、意识形态以及文化生产的角度来看，此一时期的小说所显示的活力及其复杂性，都足以让人们大开眼界。他将晚清小说视为一个新兴的文化场域，对其中所呈现的世变与维新、历史与想象、国族意识与主体情操、文学生产技术与日常生活实践等问题展开对话，并以“被压抑的现代性”作为主旨来为晚清小说理论与实践张目，从而为我们理解中国文学现代性，以及“五四”新文学革命的典范意义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他对晚清小说的研究是富有创见性的，对于本论题中涉及的历史与小说叙事之间的独特关系也有极大的启发。他的研究也为我们重新看待古典小说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诚然，不能正确地定位晚清小说在中国小说史上的地位，也就不能真正认识现代小说的革命性意义，当然也不利于我们认识中国古典小说在最后阶段做出的艰辛努力，也不利于我们认识其与史传传统的纠缠与疏离关系。所以本书尊崇王德威先生的界定，把古典小说的时间框定在“五四”运动之前。这样使论文研究从神话、史传开始直到20世纪前十年吴趼人的实验与退缩结束，显得更为流畅贯通。

二、关于本书中多次涉及的基本概念——历史叙事。历史叙事在人们的研究和批评中已经是一个十分常见的术语了。但是还没有人将此术语进行厘定和规范，只有一些零零碎碎的阐述。历史和叙事这两个看起来本是相悖的概念并用，要想澄清亦非易事。本书的最初灵感来源于海登·怀特的后现代历史叙事学。他对这一术语的界定是——历史叙事不仅是关于过去事件和过程的模式，也是形而上学的陈述；它不仅是对它所报导事件的再生产，也是象征符号的综合体。^①这一界说太过宽泛，意指只要是有关过去的一切文本形式都可以归纳为历史叙事。毫无疑问，概念的界定对于论述以及理解论述的内容都会带来便利，可以避免不必要的误读。因此特别说明，本书中所论及的历史叙事最基本的含义是指由先秦两汉以及被尊为正史的作品共同建构起来的历史意识和叙事规范，其最典型的外在表现形

^① [美] 海登·怀特：《作为文学虚构的历史文本》，参见张京媛主编《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67—168页。

态是史官式全知全能的叙事模式，其体现的内在精神是秉笔直书和褒善惩恶的叙事职责。

总之，本书从后现代历史叙事学中获得启发，从叙事学和文化研究的角度入手，对中国古典小说与中国历史叙事的复杂关系进行细致描述。本书借用西方后现代历史叙事学、中西叙事学以及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系统审视两者的关系，试图为中国古典小说的研究提供一些有意义的尝试。

目 录

总序	(1)
序一	(1)
序二	(1)
前言	(1)
第一章 史传文学与历史叙事	(1)
第一节 历史叙事与史传文学	(2)
一 历史叙事起源于神话	(3)
二 史官文化与史传文学	(7)
第二节 史传文学的四种模式	(13)
一 《春秋》、《左传》以记事为主的历史叙事模式	(14)
二 《史记》以写人为主的历史叙事模式	(17)
三 《汉书》史学化的叙事模式	(23)
四 《穆天子传》、《吴越春秋》小说化的历史叙事模式	(27)
第三节 史传文学与历史叙事的确立	(31)
一 历史叙事的确立	(33)
二 史官式叙事模式的叙述学特征	(41)
第二章 历史叙事与唐宋小说	(47)
第一节 唐前小说概述	(48)

一	古小说与想象	(48)
二	唐前小说的叙事格局	(53)
第二节	小说入史的历史叙事	(57)
一	小说入史的典范——唐修《晋史》	(58)
二	刘知几的小说观	(65)
第三节	唐传奇与虚构	(67)
一	传奇与志怪	(68)
二	唐传奇的兴盛	(71)
第四节	宋元话本小说与市民文化	(78)
一	话本小说与江南城市文化	(79)
二	话本小说的重大意义	(82)
第三章	历史演义与历史叙事	(90)
第一节	《三国志》的叙事倾向	(91)
一	《三国志》的历史想象	(91)
二	《三国演义》的民族接受	(99)
第二节	《资治通鉴》对历史演义小说的影响	(107)
一	对历史演义小说结构体制的影响	(107)
二	对演义小说道德观念的影响	(111)
三	历史叙事与文学叙事的根本区别	(116)
第三节	历史演义小说审美规范的确立	(123)
一	历史演义小说的雅俗性	(124)
二	历史演义小说叙事学的审美规范	(127)
第四节	历史演义小说与虚实理论的发展与突破	(130)
一	演义小说的通俗性	(130)
二	实录观念的突破与阐发	(133)

第四章 明清小说叙事与狂欢化	(139)
第一节 演义、英侠小说与历史叙事	(142)
一 演义小说的悲剧—道德阐释模式	(143)
二 英侠传奇小说与历史叙事	(146)
三 《水浒传》与“诲盗”之说	(150)
第二节 市民叙事图景与明清世情小说	(159)
一 世情小说的成熟	(159)
二 《红楼梦》的叙事艺术与春秋笔法	(166)
第三节 神魔小说的审美特征	(174)
一 《西游记》的市民性与谐趣性	(175)
二 “以幻为奇”的艺术真实	(182)
第四节 明清小说叙事的狂欢化	(184)
一 巴赫金狂欢化诗学概述	(185)
二 明清小说叙事的狂欢化	(191)
第五章 叙事模式的突破——晚清小说	(212)
第一节 重新认识晚清小说	(213)
一 重新认识晚清小说	(214)
二 说书模式的式微	(217)
第二节 谴责小说叙事学的贡献	(221)
一 谴责小说叙事学的贡献	(222)
二 晚清小说的狂欢	(226)
三 晚清小说的史传精神	(233)
结语	(242)
参考文献	(245)
后记	(255)

第一章

史传文学与历史叙事

研究中国叙事文学，论述的起点往往困扰着研究者，因为中国叙事文学的历史，与西方有着不同的文化路径。^① 西方叙事文学公认荷马史诗为其源头。西方从史诗到传奇到小说的发展演变过程，都是虚构性为主的叙事文体。西方叙事文学有公认的源头，而中国叙事文学的起源则成了学界公认悬案。中国叙事文学的体式，固然也有叙事性抒情诗、戏剧与小说这样三大类，但是其中的古典小说，却经历了一个由实而虚的漫长过程。从文体发生学的角度来看，模糊性和朦胧性是文体发生初期的一种必然现象。小说一开始寄生在其他文体中，那么由寄生到独立，它必然有一个漫长的过程，因此中国的小说出现了“多祖现象”。^② 神话传说、

① 美国汉学家浦安迪被公认为是对中国叙事学最早做出系统研究的西方学者。他的《中国叙事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中对历史叙述与虚构叙述之间的关系有很精彩的论述。他在另一著作《明代四大奇书》（沈亨寿译，中国和平出版社1993年版）中虽然主要是说明明代四大奇书主要是文人小说，并以此区别于通俗小说，但书中也涉及中西叙事文学的发展路径不同的比较。

② 小说“多祖”现象是从小说文体发生学的角度来研究小说的起源时的结果。明清时代很多研究者认为庄子是小说的祖先，也有人说，韩非子和列子是小说的祖先，并不是说他们就创造了小说，而是说庄子他们的思维方式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小说家的思维方式，又由那些人写出了一代又一代的小说。还有人说《山海经》是千古“语怪之祖也”，也就是志怪小说的祖先。也有人说千古小说之祖当推司马迁。我们中国小说的祖先一个是子书，一个是神话书，一个是历史书，还应加上口头传说，这就是中国叙事文学研究中小说文体发生学的“多祖”现象。当然，“多祖”并不能等同于独立的完整形态的小说本身，而是指以上所列这些文类孕育了叙事的小说因素。